

人物

如今,在天地伟业公司的门口,有这么一行大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一直是戴林用来激励自己和公司员工的名言,也是“天地伟业”名称的由来。

戴林:天地之间创伟业

■本报记者 倪思洁

20多年前,戴林从天津大学教师,变身为“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伟业)创始人,那时他29岁。

如今,在天地伟业公司的门口,有这么一行大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一直是戴林用来激励自己和公司员工的名言,也是“天地伟业”名称的由来。

从单枪匹马闯天下,到拥有近千人的企业团队;从15平方米的破旧平房,到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办公条件。随着天地伟业的壮大,当年的小伙子操劳出了满头白发。20年的自强不息,也让戴林为儿时的梦想插上了翅膀。

“在失败之前,我们还活着。”戴林从不以“成功”自诩,面对竞争压力日渐增大的安防行业,他推着天地伟业的雪球越滚越大,也引着创业的梦想越飞越高。

“梦想还是要有的”

戴林的手机很“原始”,没有大屏幕,也没有触摸屏,但它是戴林的“宝贝”。

2013年,习近平主席到天津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考察。在天地伟业展区,习主席与公司董事长戴林交谈时,戴林掏出这部手机,为习主席念了一条短信:“您的成长经历激励年轻一代……有梦想就一定会成真。”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戴林总是这样告诉年轻人。

1965年,戴林出生在辽宁海城的一个小山沟里,在上学之前,他每年都有一个小小的期盼。当时,每年地质考察队的人员会翻过戴林家所在的山,并在当地农户家借宿一晚,这些人的口袋里揣着一个半导体,这个会发声的小物件引发了戴林的好奇。这让他萌生了一个关于电子科学方面的梦想。

那时的他或许没想到,正是这个儿时的梦想,带着他一路,披荆斩棘,一步步走向人生的辉煌。

1984年,戴林考入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1991年3月,硕士毕业的他留校任教。

“当时,我们系里的经费紧张,要老师们出来为系里挣钱。”作为教师的戴林已经开始试着接触了一些项目的技术研发,而当时



戴林带领团队研发项目

系里的情况让他的创业路几乎水到渠成地铺开了。

不过,像很多初创者一样,戴林的创业起步也不容易。创业初期,戴林白天洽谈业务,晚上挑灯测试,连整理物品仓储都是自己动手。一次又一次无功而返的失望、失败、修改、再失败、再修改的循环,曾让戴林流泪过,也失望过。

为了推销产品,他一个人背着设备到处去参加展会,连上厕所都没法离开摊位。在那个索尼、飞利浦等大公司云集的展会上,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多几个人给他帮帮忙。如今,几乎每一个展会,天地伟业都能占领核心位置,这或许是当年的戴林想都没想过的。

“技术是我们的杀手锏”

2004年,戴林率领创业伙伴走上了自主

创业的道路,在滨海高新区成立了天地伟业公司。

在刚刚闭幕不久的达沃斯论坛上,戴林就大数据时代下的视频采集传输存储技术、因循技术在安防视频监控领域智能化应用以及物联网产业的发展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里,“技术”被戴林视为公司发展的“杀手锏”。

创业过程中,戴林一直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以技术领先为定位,以高清晰、智能化、行业化、集成化为目标”的发展思路。从单一的监控核心控制产品,发展到涵盖前端采集、中端传输、终端处理于一体的软硬件产品系列,并利用自身技术和行业优势,推出了一系列安防视频监控领域的解决方案,包括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公检法司、电力电讯、森林防火、教育、环保、铁路、公路等行业。

“现在为什么很多安防企业倒闭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核心技术。”戴林说,“一家企业一定要有杀手锏,而天地伟业的杀手锏就是技术,我们的定位是做一家技术领先型企业。”

如今,企业与多家公司合作,建成数字视频芯片研究实验室、DSP技术研究中心,共同从事数字安防领域高端技术的研发工作。通过全线自主研发的音视频传输控制产品向业界提供从前端到后台,从硬件到软件的一站式服务,并针对不同行业的特殊需求不断推出具有独立性、针对性、领先性的行业系统产品。

“天才就是耐性”

在会议室里,有另外两行大字:“信念协同专注”“天才就是耐性”。这是戴林对自己和员工的要求。

在戴林看来,创业有两点最重要。“一是恒心,因为从来没有创业是一帆风顺的;二是实力,要有自己的实力、心理承受能力、资金实力。”回顾这么多年的创业历程,戴林总结,“如果什么都没有,就像不会游泳还要去救人。”

“不要把自己赤裸裸地推送到市场上。”戴林说,如今,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引导下,国内的创业环境空前得好,但是市场也面临着高强度的竞争。

为了带着企业走得更远,给员工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戴林每天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戴林说,他的床头长期都有一个小小本子,“一旦有什么新想法,就立刻记下来”。

创业路走到今天,戴林给天地伟业提出了新的目标:“我们要做一家人性化的公司,使团队大多数人能够快乐工作、生活,分享企业成功;做一家业界优秀的公司,在技术和管理上有所作为,争取对行业发展作出贡献;力争在2025年,达到员工5000人、产值180亿的规模。”

关于未来的走向,戴林心中已布好了一盘棋。“铺天盖地的视频监控图像,没有意义。未来安防行业一定是基于云的大数据检索为核心的智能化体系,这将是‘灵魂’。我们正在努力通过智能分析的手段提前预警。由事后诸葛亮变成事先预防。”戴林说。

团队

当记者欲采访王宇飞研究员时,他说他马上去野外考察了,现在特别忙。每年这时候,正是他们的野外科考“黄金季”。他此行的目的是新疆。

每年八九月份的新疆,瓜果飘香,景色宜人。可这些似乎都跟王宇飞没什么关系,等着他的是风餐露宿的荒凉与孤独。而这些,他和他的同事们早已习以为常了。

这支“科研小分队”,每年会抽出一部分时间深入到人迹罕至的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目的是采集植物化石,发现可用的科学研究材料,从植物学角度,讲述植物演化历史,揭示人类生存环境的发展变化。野外,有他们事业的寄托,能激发他们的科学热忱。

用化石植物证据 估测藏北古海拔

王宇飞告诉记者,随着近期研究组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邓涛研究组以及英国、奥地利、印度等国家的专家通力合作,他们首次发现、描述和报道了藏北可可西里地区五道梁盆地早中新世五道梁组地层的小翼叶化石,从植物学角度估测出了藏北可可西里的古海拔高度在1395米至2931米之间,不同于先前有关藏北地区在中中新世之前已抬升甚至超过今天高度的假说。

“比来自地球化学研究得出的古海拔数据,这项研究进一步增进了科学界对整个青藏高原抬升历史的理解。”王宇飞说。

“这项研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从植物学角度估测藏北地区早中新世古海拔的鲜活案例。”谈及此次科学发现的重要性,王宇飞表示,青藏高原的抬升是新生代以来发生的重大地质事件,不仅直接改变了亚洲的地形、地貌、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格局,甚至影响了全球的气候变化。整个青藏高原的抬升历史直接左右和影响了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气候分异,从科学角度揭示青藏高原的抬升历史有助于增进人们理解我国西北及亚欧内陆干旱化的历史进程。而这也是他们研究的价值所在。

让科学不再留有遗憾

十年磨一剑,每一个科学发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项成果的取得其实是研究组长期工作积累的结果。

王宇飞告诉记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植物所徐仁院士等首次通过对希夏邦玛峰地区海拔5700米上新世地层中的高山标进行古今对比研究,推测该地区自上新世以来从海拔2500米快速抬升到今天的高度,成为科学界解读青藏高原高程变化的重要假说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无法获得精确的测年数据和进行古温度对植物海拔分布范围影响的矫正。

为了让前辈的研究不再留有遗憾,王宇飞研究组充分利用不断进步的青藏高原地区地层研究和精确定年技术以及关于地质时期全球温度变化等研究的最新成果,一丝不苟、循序渐进地开展和完成了一系列野外科学考察与室内研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学术进展。也正是对这些最新成果的应用,让研究组在古海拔的恢复中考虑到了多种误差的矫正,从而得到了更接近客观的数据。

“这些相关学科的突破为植物学证据加入青藏高原抬升历史的讨论,并与来自地球物理及地球化学的证据进行交叉检验,打开了一扇窗。”王宇飞说。

不仅如此,此次运用古植物学证据揭示青藏高原抬升历史的研究更是一次集体发力的结果。研究集合了当前多个国家和单位的研究人员,整合了来自不同地区的信息。其使用的现代植物标本来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国家植物标本馆和印度喜马拉雅环境与发展植物研究所植物园,化石材料则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采集,来自英国开放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印度古植物研究所等科学家参与了文章的讨论与写作。

和植物结下不解之缘

据了解,如今王宇飞的研究小组共有6位工作人员和7位在读研究生,他们的足迹不光涉及中国的新疆、青藏高原等地,还多次对南、北极进行了科学考察,工作的目的一个方面是为了采集各类植物化石,深入研究植物演化生物学,聚焦为新生代植物演化和古气候重建的研究。从大学到工作,王宇飞始终都和植物为伴,可谓和植物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也正是他的兴趣所在。

谈及未来,王宇飞说他将自己的小组成员一起,进一步从植物和气候环境之间存在的密切相关性入手,研究地质历史时期青藏高原若干重要地点的古植被和古环境,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重建这些地区在不同时间点的古气候参数(包括气温与降水)和古高程,从而进一步分析青藏高原古植被和古气候以及古环境的演化过程和规律,为人们理解现今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演化以及对全球环境变化的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科学证据。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王宇飞1986年从北大毕业就进入了中科院植物所,从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再到如今的研究组组长,其主要研究领域为植物演化生物学,聚焦为新生代植物演化和古气候重建的研究。从大学到工作,王宇飞始终都和植物为伴,可谓和植物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也正是他的兴趣所在。



王宇飞研究组

植物所供图

与植物为伴,和植物结缘

——记中科院植物所植物演化生物学王宇飞研究组

■本报见习记者 马卓敏

杂谈

共同利益,共享责任

■李静海

2015年夏季达沃斯年会“2015年新领军者年”于9月9日至11日在大连召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静海受邀参加了9月10日举行的“以合作推动科学进步”为主题的互动式会议并发言。

该互动会议由《自然》杂志主编主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校长,阿联酋内阁事务部部长,欧盟委员会研究、科学和创新专员以及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也应邀参加会议。

此次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会议主题为描绘增长新蓝图,围绕科学的变革、被颠覆的行业、经济不确定性、中国新常态、环境界限、人的意义六大主题开展了150余场各类分论坛活动。

李静海以《共同利益,共享责任》为题,围绕科技界与政府、企业之间的投入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阐述了看法。以下是发言全文,以飨读者。

面对全球性挑战和可能发生的新的科技革命,科技界总是呼吁政府和企业增加投入,而政府和企业又期望科技界尽快对投入予以回馈。一般而言,在任何国家,这两方面均难以完全满足对方的期望。

争论投入和回馈的多少,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认为比投资和回馈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提升科研的效率,这是两方面共同的利益,大家也需要共享责任。

对科技界而言,应重新审视科学技术的布局 and 科学知识之间的逻辑。现有的布局(各种学科和领域)是在人们认识局限的情况下受人为影响而形成的,有定义的学科名称就有几千个,缺乏系统的结构和逻辑,在这样的布局下部署科研,效率十分低下。科技界应当根据研究对象的层次结构和逻辑关系,构建新时期的科学技术布局。十分遗憾的是,这一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对政府而言,应当承担起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的责任。多方面的统计表明,各国创新体系效率低下是一个共性问题,创新体系的效率提升潜力巨大。政府可通过制定政策、明确各部分定位、合理配置资源及优化评价体系等,促进创新体系的几方面之间的有效合作。这对于激发创新活力,提升效率十分关键。

对企业而言,往往注重眼前,想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效益。但事实上,往往事与愿违。我认为针对企业的核心业务,提炼关键的科学问题持续支持,予以突破,发展成为方法并形成研发能力,将显著提升核心竞争力,比短期增加投入更加有效。当然,这需要有政策引导。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的兴起,新的科研范式也正在孕育之中。在应对全球挑战,迎接科技革命,发展新的科研范式的交汇点上,机遇应当大于挑战,这是各方面共同的利益,需要各方面共享责任,共同行动。这才是在Open Science, Global Science的背景下,大家应当做的大事!

所刊

行走胡同

■任园园

北京这个地方,有种小巷很独特,全城零零总总七千多条,星罗密布在京城各个角落,越是核心的闹市区,你越能在喧嚣间一转弯,惊鸿一瞥,发现别有洞天的世界。这是属于古老城区独有的居住文化,在京城,人们叫它胡同。

九年前,带着一纸入学通知书,怀着朝圣的心,我第一次踏进北京。从下火车开始,熙攘的人群,宽阔的街区,高高在上的眼神,甚至一夜席卷全城的黄沙,就是整个城市留给我的最初印象。初始的几年,走遍京城,无论是政治肃穆的浓郁气氛,还是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都挡不住让这个城市越发冷漠和陌生的脚步。我把自己闷在东五环的学校里面读书,有点近乎疯狂地读书,在这个我觉得没有人情味的地方,找寻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直到临近毕业,我去一家单位应聘,才正式开始走出校园的日子。只记得这家单位坐落在东城区的一个胡同里,应聘结束,我独自一人走在胡同里兜兜转转,一个个不同的四合院从眼前掠过,门不闭户,传出浓浓的炒菜味道,伴随着各家各户的欢笑,询问甚至争执,这种强烈的生活气息如此熟悉却又好久未得,于我来说竟如获至宝。冬日的北京,寒风肆意,找工作的不顺外加论文的压力,让本无心留恋的我,难得地停下了脚步。斜阳懒懒地把自己搁置在破旧的青石砖瓦上,在缝隙里顽强生长出来的荒草随风摇摆,一只花色肥猫眯着眼,蜷缩成一个肉球,在不高的墙上,悠闲地晒着太阳,像极了水粉画,在透明和半透明之间,浅浅的,淡淡的,在缓慢的流动中,浸透纸背,却逃离了人眼,柔润了人心。走在胡同里,风似乎都是柔和的,短短的距离,却悠长得耐人寻味,在生活的间隙里,悄悄寻觅未知的世界。

“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如牛毛”,这是老北京形容京城胡同众多的俗语。京城的胡同很有意思,无论是小资风情的南锣鼓巷、金融世家的西交民巷、传统风韵的烟袋斜街,还是流连月月的八大胡同,都记录着北京古城的兴衰荣辱。

著名的胡同,由于国家的整顿和保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护,早已成为人们心中的旅游胜地。沿其而行,装扮入流的小食店混杂着各色古香的小商铺,从早到晚川流不息的人群,你置身其中,仿佛一下就恍惚了,身体都不由自主地任由人群推搡,各色人种,飘飘忽忽,瞬间进入无法言明的主观世界,跌跌撞撞的前行,一边是着力贩卖的吆喝声,一边是佛教虔诚诵吟的大悲咒,一闹一静,哪个才是真实的世界和自己?脑袋中的声音,早已浑沌成嗡嗡的喧嚣。

那些非著名的胡同,可能更有市井的味道,底层人的生活是苦涩而真实的画面。转角处的理发店,穿着暴露的发廊妹在招揽发了福的中年男人进店,浓妆艳抹,满脸堆出的笑容无情地展现出眼角的皱纹,你看她尽量把抽了丝的丝袜一面挡在昏暗的房子里,扭转身躯的同时,想尽量遮挡,却怎么扭也遮不住。此时你再想如果我们时空可以穿梭,回到清朝著名的八大胡同里,烟花巷,男人们左拥右抱,女人们花枝招展,所谓的高低贵贱,在这花花绿绿的世界中都用“捧场”来衡量。如果你还记得二月份的帝王系列里的《雍正王朝》,刘墨林和苏舜卿两个人的爱情惊世骇俗,探花才子遇见红颜知己,官场上尔虞我诈,虚情假意,却在这烟花之地寻求到真爱,他们之间的爱超越世俗、阶级、身份、偏见,在轿子的颠簸中,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爱从不可能到圆满,从圆满到破碎,大起大落,尝尽人间幸福与苦楚。这种故事在我的想象中,就只能发生在这狭长的小胡同里,从一端到另一端,起伏,转过一个弯的瞬间,经历的,就是截然不同的人生。时间似乎就在这种幻想里飞逝,想想会觉得特别可笑,同样卑微的人,有些人即使有延残喘,也可以活得昂首挺胸;而有些人即使衣食无忧,

也只能怩怩作态。

你可能会说,在现代社会,人分两种,要么俗不可耐,要么附庸风雅,很难有真正的“大家”,真正大师的缺失,是因为没有培养大师的环境。可是在北京,有个有趣的现象,老舍、齐白石、茅盾、蔡元培、鲁迅等等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在胡同里居住。他们在大俗的市井里,创造了大雅的境界,你看他们的作品,都有即行即安满足。如果我们找找原因,你会发现带胡同里,色彩特别单调,光影是唯一有明显动感的讯息,你在胡同里慢慢走,看着各种长长的影子变幻莫测,树影斑驳的投射在墙面上,人影随着太阳的高低在各种物件上行走。红森森的大门,破旧的自行车,到处堆放的生活条件,还有随地码放整齐的煤球和砖头,这些很俗,但这就是生活本身,不是吗?我固执地认为胡同就适合黑白灰的颜色。大师们在这黑白灰里找寻色彩,似乎特别容易满足一点颜色带来的视觉冲击,短暂享受过后,又赶紧躲进四合院里,自顾自欢笑去了。其实仔细想想,在胡同里,他们的生活节奏明显慢了半拍,他们很难第一时间和社会接轨,迅速卷入狂潮,他们的生活简单而充实,在朴素的生存环境里,犀利地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却最容易看透社会的变迁。而现代社会的我们,远离安静,投身“抱负”,连风雅都懒得附庸,什么时候才能直接精进为大家呢?

在这些历史的过道里,你也可以安稳地走一走。(本文选自微生物所刊)